



姓名：邱仲麟

學歷：

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(1997)

現職及經歷：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(2005/9-)

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(2003/1-)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(2001/8-2005/9)

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副教授(2000/2-2001/7)

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講師(1992/8-2000/1)

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講師(1991/8-1992/7)



著作名稱：

- 1.〈人口增長、森林砍伐與明代北京的燃料問題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74:1(2003)，頁 141-188。
- 2.〈風塵、街壤與氣味：明清北京的生活環境與士人的帝都印象〉，《清華學報》新34：1(2004)，頁 181-225。
- 3.〈水窩子：北京的供水業者與民生用水(1400-1937)〉，收入李孝悌編，《中國的城市生活》(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5)，頁 229-28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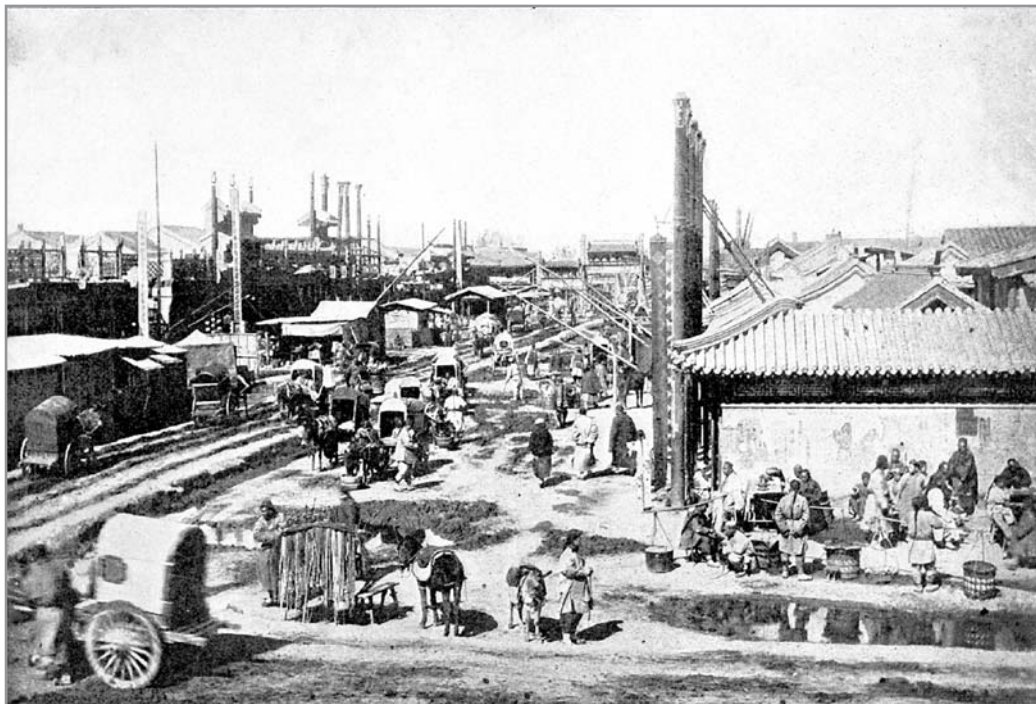
中文簡介：

〈人口增長、森林砍伐與明代北京的燃料問題〉一文，從人口增長、森林變化的角度，探討明代北京的燃料問題。明代在 15 世紀初遷都北京之後，隨著其人口的從明初的 10 餘萬，至十五世紀中葉以後的 80 萬之譜，都市人口增長所導致的生活需求隨之增加。由於燃料及建材等的需要，導致北京附近山嶺的森林，遭到附近軍民大量砍伐。至十六世紀初，北京北面的燕山、西北面的軍都山的森林，已漸次枯竭。而由於官府為了採辦宮中及各衙門所需的巨額柴炭，在太行山北段設立了易州柴炭廠。這樣的一個專責機

構，形成了對太行山森林的極大破壞，至十五世紀末，北京西南面太行山北段的森林也隨之枯竭。而在十五世紀中葉以後，因人口增長等因素所造成的燃料問題已漸次浮現之際，加上附近森林漸次枯竭，柴薪取得不易，北京居民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其使用燃料的行為，乃出現一個由柴薪為主轉向大量使用煤炭的變化軌跡。大約在十五世紀末、十六世紀初，北京都市居民用煤的情況，已廣為人所悉；而西山煤窯開挖的記載，亦愈見增多。此後，隨著森林枯竭的問題更加嚴重，都市居民對煤炭的倚賴亦漸次加深。

〈風塵、街壤與氣味：明清北京的生活環境與士人的帝都印象〉一文，考察的是明清士人對北京生活環境的觀感與記憶。對沒有到過北京的明清士人而言，他們可能從前

輩的言說與既有的記述之中，開始想像北京。這種想像，帶有一定程度的期待。等到蹴及北京之後，這些旅人的眼睛、鼻子、肌膚，開始接收這個城市的種種感覺，腦中也不斷重新翻修其原有的城市構圖。其實，他們來到北京之前，眼睛、鼻子及肌膚，甚至是耳朵、脾胃，早於記錄了家鄉的感官。這些原存在腦海的種種感官，建構了其與北京感官對照的基礎。就到過北京的士人來說，北京宏偉的城牆、壯麗的宮殿、堂皇的衙署、繁華的市街，與衆多的人口，這些都是其它城市所無與倫比的。然而，南方的士人將家鄉的記憶圖景，做為與北京對照的基礎，展開其對北京城市感官的對照。在此情況下，明清北京讓人深以為苦的漫天的風沙、無所不在的灰塵、滿街的人畜糞穢，與泥濘、積水又凹凸不平的危險路面，與穢臭



圖一

難聞的城市氣味，成為他們記憶中難以抹滅的部份。不論如何，也就因為南方士人的異地經驗，為我們留下了相當多關於北京的回憶性材料。例如：北京住民為了防阻風沙侵襲眼睛，出門必帶面紗；清代官方為了減少街道塵土飛揚的情況，有設有專責人員以水潑灑街面。另一方面，文人記憶中的另一特殊圖景，就是街道兩旁時時都有人蹲著方便（主要是男性）。對照於南方的氣候溫潤、山水有情，城市街道較為亮潔，方便問題較為完善，城市的空氣較好，南方士人的感官，也就在這情境下，對京城有著負面的對照記憶。至於北方人的指摘，則相當之少。原因很簡單，他們與北京生活在同樣的風土之下，自也少了對照的敏銳度。華北的其它城市，天上同樣有著朔風，也有著黃土的街道，以及水資源匱乏的問題。在此情況下，

風塵極為常見，而道路容易泥濘，溝渠易於壅塞，糞穢較難沖走，也與北京是一樣的。且在北方的城市，使用獸力的情況遠較南方多，故也就為城市衛生帶來多一層的困擾，這也是同北京相同的。基於這些共同的生活經驗，北方士人對北京沒有太多的埋怨與驚訝。但來自南方的士人，則不同了。易言之，南方士人對於北京的城市印象與記憶，其實是家鄉←→異地生活情境差異的反映。

〈水窩子：北京的供水業者與民生用水(1400-1937)〉一文，以產業史的角度，考察北京供水業與都市民生用水的關係。北京在明清以迄民初這五百多年間，用水問題呈現許多的面向，其一是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，北京的用水長期以來以井水為主。直至二十世紀初，洋井、自來水傳入，水質不佳的情



圖二

況才有所改善。而就用水所牽涉的制度而言，明代(1368-1644)北京，居民至水井汲水極其自由；進入清代，北京出現了由山東水夫分段把持的水窩子。這種水窩子與明代的水擔子有所不同。明代的水擔子僅是受僱於居民的挑水夫，並無把持壟斷的情況。但清代的水窩子，則分段把持水井、不准居民自行汲取，也不准該地段的居民另雇其他地段的水夫送水。明代北京的水戶主要為山西人，當山東水夫扈從八旗入關，成為北京供水市場上的新貴後，兩者的衝突隨之爆發。最後，山東水夫因有旗人撐腰，獲得勝利。自是山東水夫掌握了北京的供水事業，山西人退出了北京的供水市場。水窩子的出現，對居民造成相當大的不便，原來在大街上可自由汲取的水井(特別是甜水井)，成了私人的產業，用水自是不再方便，居民(特別是漢人)怨聲載道。在雍正及乾隆年間，官方曾欲加以解決，但最後還是承認既定的事實，採取發給營業許可的方式，允許其分段經營。清代北京由來用水主要來自井水，而水井又為水窩子所把持，因此用水的價格不低，高於長江流域的一些城市頗多，北上的南方士人對此大多有所怨懟，然而也無可奈何。更有甚者，水夫在特定的時節，如夏季或乾旱，常故意抬價，而且水質也不見得好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北京居民平時大多撙節用水，於衛生似也無法多做要求。而為了節省開支，節約用水，因此居民每日平均的用水量並不大，社會上層的住戶大約可達 10 公

升，而一般百姓或許僅有 4、5 公升。至二十世紀初，北京出現了集資興辦的北京自來水公司。雖然自來水較為乾淨衛生，但其在競爭的過程中，顯然未佔上風，反倒是舊的井商依然能保有大部份的市場。另一方面，北京居民長期以來已習慣井水，滿人甚至認為自來水是「洋胰子水」，不可飲用。而且，自來水裝管的費用過高，大部份居民消費能力不足，也都給予井水業者很大的營業空間。因此，北京即使出現了自來水，居民使用井水的用水方式，直至民初並未出現大幅改變。

評審簡評：

邱仲麟先生長期以來從事明清制度史、醫療史及社會生活史與城市史的研究，成果豐碩，質量俱佳。他往往能夠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，別出心裁，透過課題的選擇和細節資料的呈現，不斷帶來驚喜，讓人耳目一新。此次送審的代表作集中在明清北京城市生活的各個不同面相，從官方文書、筆記小說到文人文集等各種不同的資料中，重新建構明清北京的生態環境、民生用水乃至風塵氣味等各種細節，興味盎然。發人之所未發，為明清城市史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開啓新頁。

不論是在研究方向的開拓還是資料的掌握運用上，邱仲麟先生無疑的都是一位卓然有成，值得特別鼓勵的年輕學者。